

科學時代的理性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原著：伽達瑪
編譯：結構群

B518
891-2

713332

港台書室

科學時代的理性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原著：伽達瑪

Hans-Georg Gadamer

編譯：結構群



90087069

科學時代的理性

定 價：150

原著者 —— 伽達瑪
編譯者 —— 結構群
校 對 —— 廖秀惠
 廖美智
 王惠萍

發行人 —— 謝公秉
出版者 —— 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連絡處 ——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333巷10號1F
電 話 —— (02)363-9416(早上10~下午5點)
郵 撥 —— **1170349-3**楚有勝帳戶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4632號
法律顧問 —— 陳國雄律師

獨家銷售・備有詳細目錄・歡迎來電索取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缺頁破損・請寄回退換

初 版：中華民國79年12月15日

出版說明

這本《科學時代的理性》(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是當代詮釋學大師伽達瑪(Hans-Georg Gadamer)一系列有系統的文章所精心選取出來的。這書英文本由Frederick G. Lawrence 翻譯。

伽達瑪是現代詮釋學大師，在國內的翻譯並不多，我們正努力把牠介紹入國內，因此繼《理性・理論・啓蒙》後，我們把這本《科學時代的理性》出版。誠然，雖然我們已努力做好我們所應該做的，但難免有所錯誤，我們期望賢者們不吝指教，更期望更好的譯本問世。

結構群 謹識

科學時代的理性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出版說明

第一章 論科學中的哲學成素與哲學底科學特性 1

第二章 黑格爾哲學及其影響 23

第三章 黑格爾的遺產 43

第四章 實踐是什麼？——社會理性底條件 83

第五章 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 103

第六章 作為理論與實踐任務的詮釋學 131

第七章 論人類對哲學的自然傾向 161

第八章 哲學還是科學理論 173

第一章

論科學中的哲學成素與 哲學底科學特性

顯然，我們稱之爲哲學的東西，不等同於所謂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哲學並不是擁有一批並列於其它科學的標準研究（the standard research）領域的實證的材料，可以據之進行單獨研究，因爲哲學必須涉及整體。但是，這個整體並不像其他任何整體，只是包含了它的一切部分的整體。作爲這個整體，它是超出所有知識的有限可能性的一種理念（Idea）。因此，它就不是我們以一種科學方式所能認識的東西。然而，討論哲學的科學特性仍然很有意義。所謂哲學，人們常以意指作爲獨特的世界觀的一些主觀的和個人的問題的集合（Congeries），這種獨特的世界觀自滿（Fancies itself）超過對所有科學的地位之要求。同這種意見相反，哲學理應被稱爲科學的，因爲不管它

2 科學時代的理性

與實證科學有着各種差異，它仍然具有一種與實證科學相關的近似性，這就使哲學區別於建基於嚴格的主觀證明的世界觀領域。

這不只是關於哲學起源的觀點，因為根據那種觀點，哲學和科學是不可區分的一（Indistinguishably one），二者都是古希臘人創作（Creavion）。古希臘人以“哲學”這個內容豐富的術語指稱各種理論知識（Theoretic knowledge）。同時，我們使用一些古希臘的語詞談論東亞或印度底哲學；但由於這樣做，我們實際上是將這種思想結構與我們西方的哲學和科學傳統聯繫起來了，甚至是在試圖理解那些與我們的傳統完全不同的材料的意義，比如說，沃爾夫（C. Wolff）將“中國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明確表述為“實踐哲學”（Practical philosophy）。

然而，在我們的語言使用中，哲學在這裏也還意指所有能被稱為“科學中的哲學成素”的東西，那就是決定任何既定科學的客觀領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向度（Dimension）。例如無機自然界和有機自然界，植物界、動物界或者人的世界等。並且，哲學在自己的思考和認識方式中，絕不打算落於科學的維繫特性（The binding of the sciences）之後。儘管這種哲學今天樂於自稱為“科學理論”（Wissenschaftstheorie），它依然遵守這個要求：哲學要提供說明（Rechenschaftsgabe）。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本身不是科學的哲學，怎麼能對科學具有維繫特性？特別是如

今研究底邏輯(The logic of research)已充分意識到，禁止任何關於不屬於其規則的這整體的純然想像式的思辯，哲學怎麼能充分實現給與說明的要求？

當然，有人會提出科學在各個方向的增產，這種增產雖然實行了科學的方法觀念，却未能滿足理性的終極需要：能夠在存在者(What is)的總體性(Totality)中保持統一性。所以，要求對我們的知識作出系統的和廣泛的連結(Comprehensive articulation)，仍然是哲學的合法領域。但正是對哲學造成了一種建立系統整理的這種確信，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懷疑。現在，人類似乎準備以一種新方式承認它自己的局限性，並且，儘管科學所逐漸了解的知識有難以克服的特殊性，人類似乎仍然準備以一種新方式在日益增長的對自然的支配中尋求滿足。人們將這種對自然的支配歸因於知識的特殊性。人們甚至考慮這事實，即人對人的統治並未隨着對自然的支配的日益增長而消除，而是同一切期望相反，這種統治變得日益強大，並且從內部威脅着自由。技術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它支配人類社會、公衆意見的形成、每個人的生活行爲、每個人對職業和家庭中時間的安排到了使我們震驚的地步。對於處理人類社會秩序方面，形上學和宗教似乎提供了一種比現代科學所包含的那種能力更好的支持。但是在現代人看來，形上學和宗教自稱能夠給出的答案，是對人們實際上不能提出的問題的回答，並且如他們設想：這不是人們真正需要探討的。

所以，黑格爾(Hegel)從有哲學實在性(The

4 科學時代的理性

reality of philosophy) 的充分保證之立場出發，認作是不可能的矛盾：一個沒有形上學的民族 (People) 就像一座沒有祭壇的神廟，一座空的神廟，一座沒有任何東西寓於其中的神廟，因而它本身也不再是任何東西。現在看來這似乎已經變成真實的了，他的話是：“一個沒有形上學的民族！”人們必注意到它所指的，在黑格爾這句話裏，“民族” (Volk) 一詞，不是一種政治的統一體，而是指一種語言的共同體 (Community)。然而，黑格爾這個可能已經喚起激情或懷舊情感 (Nostalgia)、甚至引起激進的啓蒙方式的嘲弄，突然再次投入我們的時代和世界情勢中，它帶着全部的嚴肅性向我們追問：在聯結起一語言的所有言說者的統一體 (Solidarity) 中，從根本上說，是否存在某種東西，人們可以考察它的內容結構，却沒有一門科學甚至有可能提出一個有關它的問題？科學不僅不進行思想（就海德格 (Heidegger) 在他常被誤解的陳述中對“思想”一詞所強調的意義而言），而且實際上也不會在恰當的意義上講一種語言，這一點是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毫無疑問，語言問題已經在本世紀哲學中獲得了一種中心地位。它佔據的這種中心地位既不同於洪堡 (Humboldt) 語言哲學的較陳舊的傳統，也不同於一般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寬泛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把語言問題之獲得中心地位歸功於對實踐生活世界的重新確認。這種重新確認，一方面發生在現象學研究中，另一方面發生在盎格魯—薩克遜 (Anglo-Saxon) 的實用主義思想傳

統內。語言始終屬於人類生活領域，所以，隨着它的主題化（Thematization），有關那整體的古老形上學問題的獲得一個新基礎，似乎是可用的。在語言的脈絡中，語言不只是工具，或者是一種人類天賦的特殊的能力，毋寧說是一種中介，即我們最初就作為社會本性（Social nature）而生活在其中的中介，這種中介開示了我們實行我們於其中的總體性。所謂對這整體之朝向（Orientation）就是：某些如此的實在性（Reality）是基於語言，但並不是說它是一個處理科學符號底談話之獨白模式，此模式完全為在任何既定情況中所指派的研究領域所決定。但是，作為朝向整體的語言就要作用於凡是在真正的交談發生的地方，也就是兩個談話者圍繞主題進行交談而發生交流中。對任何有交往發生的地方來說，語言不僅被使用，它還被成型。正因如此，當哲學探討它的嚴肅問題而超出每個在科學上可具體化的對象領域時，哲學能夠為語言所引導。從蘇格拉底的啟發式談話（Educative talk）和那種對於邏各斯（Logoi）獨特的辯證朝向（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曾將它看作知識分析的標準），語言就在指導着哲學。在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o）中，蘇格拉底對那個時代的科學沒有留下任何朝向地提供給他的事物作了無中介的研究之後，進入了那個著名的靈魂的“第二次的旅程”（Second best journey）。正是在轉向理念中，作為靈魂與自身的談話（處在一種無盡的自我理解的過程中的思想）的哲學才被激發起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語言，曾努力想要揚棄那種在正反陳述中已經僵死

地概念化了的語言，揚棄格言與矛盾，而使這種語言超越其自身。但是，由於語言是一種手段，只是通過語言並且在語言之中概念才被帶至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以至它的成功也只是在於：通過思想並且在被轉化為語言的存有自身中（in being itself converted into language）推動語言，才會成功。

這樣看來，希臘哲學底基礎，當然是這種無限的求知本性，但確實不是那個我們稱為科學的東西。假如形上學最早的名稱是“第一科學”（Prima philosophia）構成傳統形上學的內容的，諸如關於上帝、世界、人類存有，對於所有其他知識（其典型例證是在數學科學、數論、三角和音樂（天文學），就不僅以一種無可爭辯的方式具有一種絕對的先存性（Absolute primacy），相反，我們稱為科學的東西甚至大部分並沒有進入古希臘“哲學”（Philosophia）一詞的使用範圍之內。“經驗科學”其意義在希臘人而言會是刺耳的，他們只稱那些東西為歷史和資料。和我們通常的科學概念相應的東西，他們至多理解為一種可以在從事製作和生產活動的基礎上之知識。古希臘人把這種知識稱為生產性的知識（poietike episteme）或者技術（techne）。對此，過去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醫術，它一度是這類技術的主要種類，對於它，就算我們願意推崇其任務的人道面，也還是寧肯稱它為治療術（The art of healing），而不是科學。

所以，我們在這裏所關心的題目，以它的方式包含了西

方歷史的全部進程——從科學的開端到現在批判的情勢（Critical situation）。在這批判的情勢中，人們發現了一個世界，它在科學的基礎上已轉變為單獨的、巨大的事業。仍然存在着那種智慧之傳統與另一種文化脈絡中的知識，它們並不以科學語言，並不根據科學表達自己。就我們正在將上述的情況視作為一種挑戰而言，我們的問題因而同時擴展至超出了我們自己歷史底現存世界。因此，很清楚，提出一個哲學與全部科學（Science in its full scope）之間的關係這種論題，在方法上是適當的。這即意謂考慮哲學與科學的這種關係，就像考察它們的希臘發端那樣，考察它們在現代性（Modernity）中已經逐漸顯露出來的新近後果。不論關於現代性發生年代和源起有多少爭議，這一概念還是由科學和方法的一種新觀念的出現得到了明確界定。它最初由伽利略（Galileo）在局部的研究領域中形成，由笛卡兒首次哲學地奠定。所以，從十七世紀以來，我們就發現，今天所說的哲學處在被改變的情勢中。面對科學，它開始以過去從未有過的方式，為自己的合法性尋找證明；而且在直到黑格爾和謝林（Schelling）去世的整整兩個世紀中，哲學實際上是在反對科學的自衛中被構建的。上兩個世紀的系統的偉構（Edifices）表現為調合形上學傳統與現代科學精神的一系列努力。此後，隨着進入孔德（Comte）以來所謂實證時代，人們從相互衝突的世界觀的大風暴中，企圖用一種對哲學底科學特性（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philosophy）的純學術的嚴肅態度，把自己挽

救到堅實的土地上。哲學因而就進入了歷史主義底泥塘，或者擱淺在認識論的淺灘上，或者徘徊在邏輯學的死水中。

通向決定哲學與科學底關係的第一條途徑，就基於返回到：哲學底科學特性仍被視為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之時代。最近的是黑格爾和謝林的時代。一個半世紀以前，關於我們全部知識底統一性這種意識中的重新高揚（Heightening），黑格爾和謝林所作的體系構想，試圖為科學提供一種新的證成（Justification），並反過來將唯心論建立在科學基礎上。謝林試圖以他對觀念論（Idealism）的物理學證明完成這個任務，黑格爾則試圖在“實在哲學”與“理想哲學”（Idealphilosophie）之對照中，把自然哲學與精神哲學結連在“實在哲學”（Realphilosophie）之統一中。

看來，人們不可能重新進行這種思辨物理學（Speculative physics）的嘗試，它在十九世紀被使用過，同時又被作為一個反對哲學的口實受到了攻擊。當然，理性對於統一性和認識統一性的需要至今依然存在，但是，現在它已認識到自己與科學底自我意識相衝突。科學越忠實越嚴格地理解自己，它對一切有關統一性之保證和有關終極有效性的要求就越是懷疑。洞察了為何思辨物理學的努力、使各門科學整體化為哲學所引導的科學系統的努力已經失敗，從而就使我們更明確地認識到科學的範圍和局限。

黑格爾和謝林他們並不是對經驗科學的自律性的合法要求視而不見。經驗科學追求自己底方法的道路，並且通過自

己的循序漸進的程序，已經提出了現代哲學的新任務。黑格爾在他事業巔峰狀態的柏林時期，曾在他的《哲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二版序言中告訴我們，他怎樣看待哲學與經驗科學之聯繫，以及所牽涉到的哲學問題。我們現在這裏所面對的問題之偶然性，不可能完全由概念底必然性（Necessity of concept）推演出來，這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即使是那種極其少有的、而有保證的預言的事情（例如以我們太陽系的巨大的空間關係計算晝夜、日蝕的時間長度等等），也包含有一種總會出現的誤差（當然，任何觀察底真正可能性，都會使這種誤差降到最低限度）。更重要的是，上面這些被預測的天文事件的現象（Appearance），其本身不可預測，因為任何對自然的觀察都依賴於氣候條件。但是，誰人願使自己的可靠性以氣象預報為基礎呢？

涉及這種極端的例子，當然不是一個關於特殊、偶然事例與必然性之間普遍關係的問題，而是科學內部的問題架構（Problematic）。黑格爾已經指出，在一般規律的必然性與單獨事例的偶然性之間，存在着一種描述的統一性。如果以概念的必然性來比較，自然法則本身底必然性就要被看作一種偶然的必然性。它不是一種理智的（Intelligible）必然性，或許，人們可以稱它為——一種生命有機體在物質互換過程中保持着自身的理智的必然性。在研究自然之領域內，數學上的精確規則性的公式，是一種接近的理想。它是有關統一性、簡明性、合理性以及優美性的一種相當模糊的標準意象（Image），命題中所陳述的法則就遵循這樣的意象。它們真正的標準只是經驗材料本身。

人類事務的領域似乎主要屬於偶然性範圍。歷史的懷疑論從經驗中獲得的支持，遠遠超過它從歷史必然性和歷史中的理性念中所獲得的支持。如果人們準備訴諸的只是歷史進程中的規則性——這種規則性正如自然的法則，按照它們的本來意義，只是被用來表達實際上發生的東西，那麼，這裏的這種理性的需求就將完全不能得到滿足。

理性的需求的意思是指某種別的東西，黑格爾底世界歷史哲學就是對它的一種很好的說明。存在於人類本質中的先天性思想，黑格爾從歷史中逐漸理解的先驗思想，就是自由底思想（Thought of freedom）。黑格爾關於東方世界、古代世界以及基督教世界的著名構想，貫穿了這種自由底思想。在東方世界中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①；在古代的西方某些人是自由的^②；在基督教世界中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這就是世界歷史的合理目的（Intent）。這並不是說，世界歷史在其歷史地展開之一切事實細節中都是可理解的。人們稱為偶然現象的全部範圍仍然是無限的。然而，偶然事件並不是相反的事例，它恰恰是作為屬於這概念之必然性意義的證實。被黑格爾作為基督教世界的原則所提出的那種每個人的自由，實際上還沒有發生，而不自由的時代還在繼續出現；事實上，那種社會的不自由體制，像在我們自己所處的

① 這裏暗指皇帝，一個極權的世界。——譯者

② 暗指希臘：城邦中的公民是自由的，但他們所擁有的奴隸却不自由。——譯者

嚴重的世界情況中那樣，最終以一種不可避免的方式被建立起來了。但這種偶然情況，也不是一個對世界歷史的理性目的的反對理由。這些都落於人類事務的偶然性範圍，不過這偶然性並不適用於反對自由的原則，因為沒有比自由的原則更高的理性原則。黑格爾的見解是如此，我們的見解也是如此。比一切人的自由的原則更高的原則，是不可想像的。我們也正是從這一原則出發理解現實的歷史：把它看作為了自由而進行的永遠更新、永不完結的鬥爭。

以為屬於概念的這合理面能為事實（Facts）所駁斥，這是人們常常遇到的一種誤解。黑格爾那個有名的說法：“害大莫於事實”，包含了一種深刻真理。這個說法不是針對經驗科學的，相反，它針對的是黑格爾在柏林序言中所說的對矛盾的粉飾，這種矛盾揭露出哲學與科學間的鴻溝。黑格爾對這種“溫和的啓蒙”（Moderate enlightenment）不抱任何希望。因為，在其中，科學的推廣與以理性概念作出的論證發現它們雙雙處於某種妥協的地位。那是“一種僅在表面上有利的條件”，那種和平是“相當表面性的”。“但在哲學中，精神（The spirit）却恬然自安於這種和諧。”很明顯，黑格爾想說，對統一性的這種理性需求在這是無條件地合法的，並且，這種需求只能由哲學來滿足。反之，科學只是由於自矜絕對地置定了（Posit）自己，才與哲學發生了無法解決的矛盾。這恰恰正是在我們關於一切人的自由的例子中的情況。任何人，如果他還不懂這正是歷史，不懂一切人的自由已經成為一種不可反駁的原則，並且依然

需要重新努力去實現這個原則，他就沒有理解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係，也沒有理解哲學關於認識具體的合理性的要求。

我們現在不僅從歷史學科（Historical science）領域看待黑格爾，那裏他的豐富貢獻已經值得重視，而且，以更爲公正的觀點，從自然科學的領域看待他。黑格爾站在他那個時代科學的頂點，他爲此，同樣，謝林爲其自然哲學付出了荒唐的代價。這種代價不在於資料的情況，而在於對作爲“對立於經驗地建立的知識”之事物底理性洞察之本質多樣性之排斥。無疑，這種情況出現在謝林和黑格爾那裏，但更出現在經驗自然科學那裏。當自然科學對自己的前提茫然無知時，一種在被制約性（Conditionedness）內認識自身的經驗知識，必定實際上採取這種作用方式，即在它自己底研究領域中，它堅持它自身，並且使自己擺脫各種獨斷的使用。或許時至今日，這種教訓依然沒有被充分關注：哲學不能夠被硬加在科學研究工作之上，相反地，只是當科學制止了哲學的補充和思辨的獨斷對它的限制時，哲學才真正地發揮作用。由此，科學也就避免了哲學對它的這種直接干擾。黑格爾和謝林是他們自己包羅萬象的獨斷臆想底犧牲品，更是科學的獨斷論底犧牲品。

後來，當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和現象學（Phenomenology）再次主張，將涉及到先天給定性（a priori givenness）現存研究領域之基本概念作爲它們底對象時，這些研究領域本身當然否定與這樣一種巨大事業